

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便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的迅速崛起。对于每个民族国家，甚至对于全人类来说，全球化均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对于地球资源的合理配置、文化学术的交流、国际社会的合作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也给全人类带来了许多严峻的挑战。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又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是顺应全球化的潮流，继续致力于推进全球化进程；还是努力阻止全球化进程，使全球化进程逆转，重拾民族主义大旗。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效的解决全球问题的有效方案，就是全球治理。要有效化解全球化面临的严峻挑战，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保护全球的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

中国学者 论中国与全球治理

◎ 俞可平 / Arif Dirlik 丛书主编 ◎ 俞可平 执行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ZHONGGUO XUESHIZH
JUN WENXUE JI DULIAN ZHONGGUO

自然环境，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实现人类的普遍价值，全球治理是不二的选择。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主体、体制、法律、效果、评价指标、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贡献了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的独特见解。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紧迫问题，应对全球严峻挑战的关键所在。我们应当对全球治理怀抱全球善治的理想。总而言之，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转的严峻时刻，人类应当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全球化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应当重新树立对全球治理的信心，将改善全球治理当作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途径，并坚定不移地追求全球善治的理想目标。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

中国学者 论中国与全球治理

◎ 俞可平 / Arif Dirlik 丛书主编 ◎ 俞可平 执行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ZHONGGUO XUEZHE LUN ZHONGGUO YU QUANQIU ZHILI

编委会成员：蔡拓 Bruce Cumings Arif Dirlik 黄平 Richard Kraus 王逢振 叶文虎 俞可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者论中国与全球治理 / 俞可平, (美)阿里夫·德里克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229-12911-8

I. ①中… II. ①俞… ②俞… III. ①全球化—文集 IV. ①C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1713号

中国学者论中国与全球治理

ZHONGGUO XUEZHE LUN ZHONGGUO YU QUANQIU ZHILI

俞可平 Arif Dirlik 主编

俞可平 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徐 飞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5 字数:240千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911-8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

中文版总序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同样体现在思想文化中。但是,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言,中国的思想文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要小得多。尽管中国学者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但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依然所知甚少。特别是欧美中心主义的偏见,使西方学术界很少关注欧美国家之外的思想文化发展。例如,近年来我们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但中国学者的论著在欧美国家用当地语言发表的则凤毛麟角。另一方面,我们则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国外的有识之士已从单纯关注中国经济,转而开始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包括关注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各个方面。

中国的思想文化本来就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反之,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也同样需要融入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全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需要各国学者的智慧和思考。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全球性的内在要素。因此,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比以前显得更加重要,也更为紧迫。

中国已经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问题必然也是全球的问题;反之亦然。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以及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无疑是相

当重要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当认识到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中国学者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观点。本论丛的根本宗旨之一，就是克服中外学者之间简单的“中—西”思维定式。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重庆出版社和荷兰的博睿（Brill）出版公司决定联合推出这套中英文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重庆出版社负责论丛中文版在中国的出版发行，博睿公司负责论丛英文版在欧洲和北美的编辑出版。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国际编委会，由中国学者、欧洲学者和北美学者一起编选这套丛书，并由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和我共同担任论丛的主编。本论丛共分六卷，分别围绕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民主与法治”、“全球化”、“世界经济及中国的作用”、“和平与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与文化转型”等六个热点问题，选取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在中国与国外陆续出版发行。我们力图通过这套论丛，展现中国学者在一些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从而让中国学者直接参与国际学术讨论，也让国际学术界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成果。

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中英文双语学术丛书，是一种将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新尝试，无论是编者和出版者都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从主题的确定、文章的编选和合作的方式，到作者的版权、英文的翻译和编辑的技术，无不充满着困难。没有编者的执着、出版者的魄力和作者的合作，都会功亏一篑。在此，作为丛书的主编，我们诚挚地向《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的中外编委和各卷主编、各位作者和译者，特别是重庆出版社和博睿出版公司，以及所有为论丛的出版作出过贡献的友人，表示深深的感谢。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俞可平

美国俄勒冈大学资深教授 阿里夫·德里克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Arif Dirlik）

走向全球善治（代序）

21 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便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的迅速崛起。对于每个民族国家,甚至对于全人类来说,全球化均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对于地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人类的自由迁徙,对于文化学术的交流,对于国际社会的合作,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实现,对于世界的和平,对于全球的生态保护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全球化也给全人类带来了许多严峻的挑战,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抬头,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

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又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是顺应全球化的潮流,继续致力于推进全球化进程;还是努力阻止全球化进程,使全球化进程逆转,重拾民族主义大旗。对于清醒的政治家和学者来说,既要看到全球化正在给人类带来的严重挑战和风险,更要认识到全球化对人类自身解放的内在价值和必然要求,尤其需要寻求遏制和消除全球化消极作用的出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效的解决全球问题的有效方案,就是全球治理。在我看来,要有效化解全球化面临的严峻挑战,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保护全球的自然环境,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实现人类的普遍价值,全球治理是不二的选择。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是中国学术界一个新的热点领域。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主体、体制、法律、效果、评价指标、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贡献了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的独特见解。中国学者清楚地看到,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各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各国人民的命运事实上已经紧密相连。全球问题的解

决,急需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全球治理机制。全球化既为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国际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也增大了全球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的事情尤其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尤其需要在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开展国际合作、追求国际正义等方面达成全球性的共识。

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政府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主动地承担起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大国责任,努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合理化。中国领导人积极倡导平等、公正、合理、互利、合作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观,不断寻求全球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持续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还推出了许多旨在完善全球治理的重大举措。例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活动和联合国维和活动,带头参加控制气候变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坚定地支持联合国系统的合理化改革,支持二十国集团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支持世界银行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并将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途径,为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基础设施投资作出贡献。

然而,从世界范围看,全球治理的格局还很不合理,全球治理体制还很不完善,各国推进全球治理的行动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国际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现实进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全球治理已经取得一些明显的成果;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还远远落后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

从积极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些令人高兴的发展: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重视程度在提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在增加。全球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除了民族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之外,其他全球治理主体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大,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从总体上说,全球治理的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正在日益增大,个别超级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某些全球问题领域,如抵御全球金融风险、应对气候变暖、打击国际犯罪、遏制全球恐怖活动、控制传染病等方面,各国的合作程度在增加。全球治理正在重构全球共同体,催生新的全球认同。

从消极的角度看,全球治理的效果极不理想,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在继续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全球环境的恶

化,特别是大气变暖,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国际恐怖活动对人类的威胁在进一步增加,国际社会明显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地区性的局部暴力冲突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趋势在增强而不是削弱;国际贸易的速度并没有预想的那么迅速,特别是近几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速度明显放慢;众多的全球治理领域还缺乏有效的国际规制;全球治理机构的权威性严重不足;国家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有些国家在全球治理上采取双重标准,使得全球治理在一些领域和国家几乎完全失效。全球化在产生全球治理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风险。

面对全球治理的这种现状,我们应当怎么办?在我看来,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紧迫问题,应对全球严峻挑战的关键所在。我们应当对全球治理怀抱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实现全球善治。全球善治是全球所有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全球善治是国际秩序的最佳状态,它既是各国政府间的最佳合作,也是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最佳合作。正如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一样,全球善治则是世界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所在。全球善治为全人类的治理设定了一个长远目标,可以使世界治理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国家利益至上”,一直被各国政治家奉为国与国交往的金科玉律。毫无疑问,它还将继续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准则。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不仅不相冲突,而且后者成了前者的前提条件。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人道灾难、经济灾难和战争灾难一旦发生,国家利益往往便无从谈起。与此相一致,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旦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得到了切实的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会随之而得到切实的维护和增进。因此,追求全球善治,不仅是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民族国家的公共利益。

实现全球善治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互信。

国际合作是通往全球善治的唯一道路。“9·11”事件后,有一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这句话就是:“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我们自己才能实现自由;只有别人处于安全状态,我们自己才能安全。”这表明人类日益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合作,才能保

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只有合作,才能遏制跨国犯罪;只有合作,才能预防全球风险;只有合作,才能消除人类的贫困;只有合作,才能维护人类自身的安全;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全球的民主治理;只有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简而言之,地区之间的相互合作、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民族之间的相互合作,是人类实现幸福、繁荣与和平的必经之路。

国际合作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人类在科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每一种文明都既有它自己的独特优势,也有它内在的不足。只有取长补短,虚心学习其他民族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每一种文明才能不断进步。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种伟大的文明,她之所以伟大,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善于向其他民族和其他文明学习。国际间的合作,为民族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学习的过程。

全球善治所要求的国际合作,是一种跨文化的合作。国际合作的最终目的,既是为了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增进民族国家自身的利益。因此,真正的国际合作,不仅应当是超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合作,而且也应当是超越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别的合作。全球化时代不应是文明之间相互冲突的时代,而应当是各种文明相互融合的时代。跨文化的国际合作,是最深层的国际合作;跨文化的合作,是促进各种文明之间相互融合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跨文化的合作,才能使人们的民族认同与全球认同不相冲突。

全球善治所要求的国际合作,是一种建立在多样性之上的合作。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人类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全球化不仅没有消除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反而凸显了民族国家的自主性;不仅没有消除民族传统文化,反而凸显了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全球化是一个国际化与本土化、普遍化与特殊化、一体化与碎裂化、同质化与异质化相并存的过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不应以牺牲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为代价,而应当在保持民族国家多样性的前提下追求全球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做到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

全球善治所要求的国际合作,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必须建立在

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有效的国际合作,对于合作双方来说,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国家与国家之间才能有积极和长久的合作,才能将国际合作的利益最大化。“胡萝卜加棍棒”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人类需要的是以公正、民主、平等、宽容、友爱、信任和共赢为特征的新的合作模式。人类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有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才能引导各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迈向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人类的整体利益。

加强跨文化、跨国别和跨制度之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促进跨文化、跨国别和跨制度之间的国际合作,既是各国政府和各国间组织的重要责任,也是全球公民社会的重要责任;既需要各国政府的积极行动,也同样需要全球范围内各种民间组织的积极行动,特别是各国人民的主动参与。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扩大的今天,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应当主动积极地为推动国际合作做出贡献。只有这样,人类才会拥有乐观的前景和积极的未来。

跨文化、跨国别、跨制度的国际合作的前提,就是人类的相互信任。既然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那就须臾离不开相互信任。因为互信是联结共同体的纽带,是构成人类共同体的一个基本要素。没有互信,就没有人类的共同体;没有全球互信,就没有全球共同体。信任可以消除相互猜疑,增加国际社会的安全感;信任可以防止对立和冲突,增强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信任可以使大家自觉遵守共同的规则,有利于改善全球的秩序;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信任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国家如此,对于国际社会也同样如此。没有足够的全球互信,就难以形成全球价值、全球共识和全球认同,就难有全球安全感,从而也就难以开展积极的国际合作。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转的严峻时刻,人类应当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全球化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应当重新树立对全球治理的信心,将改善全球治理当作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途径,并坚定不移地追求全球善治的理想目标。

俞可平

2017年12月

目 录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中文版总序 / 1

走向全球善治(代序) / 1

第一部分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中国

俞可平 全球治理的趋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 3

蔡 拓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 9

何 帆 冯维江 徐 进 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 / 20

李东燕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 43

许 琳 陈 迎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 60

吴志成 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 81

陈志敏 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建构 / 90

第二部分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秦亚青 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 / 103

卢 静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 120

张胜军 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 / 136

王 毅 试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制度建设 / 159

张 茗 全球公域:从“部分”治理到“全球”治理 / 169

徐秀军 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 / 19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 联合国改革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 227

当代中国

思想

文化论丛

中国学者论中国与全球治理

第一部分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中国

全球治理的趋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俞可平^①

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政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便是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论思潮与实践活动的兴起。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真正的全球秩序。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和有效的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有五个要素: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全球治理的对象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人类对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觉醒,也表明人类为追求全球安全和普遍繁荣所做的努力。

全球治理的兴起,有五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全球问题的迅速增加;二是传统的国家主权遇到挑战,维持世界秩序需要新的方式;三是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国际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四是世界政治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国际社会进入多极化时代;五是一些国家治理失效,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在所有上述原因中,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其对传统国家主权的冲击,是全球治理变得日益重要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

^①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既有单一化,又有多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传统国家主权构成严重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的兴起。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哪些演变趋势呢?

首先,民族国家依然是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的主体,从而也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但是,超国家组织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日益增大。一些重要的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20 国集团(G20)、北约组织(NATO)、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开始深度超越各主权国家的传统边界,对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进程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特别是联合国及其所属的各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了突破性的拓展。跨国组织权力的加强与传统国家主权的削弱,已经成为全球治理过程中一个相辅相成的现象。

其次,全球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除了民族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之外,其他全球治理主体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大,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跨国公司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政治生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开始强调非政府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跨国公共活动领域,其基本的组成要素是国际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包括各种跨国社会运动、非政府社团、无主权组织、政策网络和学术共同体等。这些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它们既在国内影响民族国家的政策议程,也在国际影响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形成;既在现实世界活动,更在虚拟世界发生影响。

其三,全球治理使主权国家的权力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变得模糊。全球治理使得一些原来的国内问题成为国际问题,反之,一些原来的国际问题则成为国内问题。全球治理势必要涉及气候变暖、生态失衡、物种濒危、疾病蔓延、种族灭绝、人道主义灾难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但是,所有这些全球问题同时也是个别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国内问题。作为国内问题,任何国家有权按照自己

的选择进行管理和处置,它不受外部力量的干预;但作为全球问题,每个民族国家在处理它们时又必然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必须与国际社会共同担负起全球治理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的传统界限就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其四,全球治理的价值日益呈现出“和而不同”的面貌。全球治理的价值,就是各个国家的普遍追求和国际社会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就是“全体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相互的尊重、爱心和正直”。从理论上说,全球治理的价值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之上的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然而,由于各国多样性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的政治经济现实条件,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中有着极不相同的内涵和意义。有效的全球治理一方面要求各国之间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各国的多样性需求,唯一的出路便是“和而不同”。

其五,全球治理的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正在日益增大。全球规则就是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的秩序,实现全球治理普遍价值的规则体系。具体地说,全球规则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规则在全球治理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因为若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确实对国际社会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全球治理便无从说起。然而,与国内规则相比,全球规则的效力却明显弱化。导致全球规则失效的原因通常有三个,一是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二是全球规则的不合理,三是全球规则为少数强权国家操纵。全球规则的失效,必然损害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也终将损害违反者的狭隘国家利益。令人高兴的是,从最近这些年的全球治理实践看,西方发达国家操纵全球规则的局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在制定全球规则中的发言权不断增大。各国政府和民众日益认识到全球规则对正常国际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全球规则的效力正在明显增大。

最后,全球治理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全球性与自主性是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相互对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属性,全球化在产生全球性的同时,也制造着自主性。全球性表现了同质性,自主性表现了异质性。自主性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对全球性的一种抗体。全球化并没有消

除国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凸显了国家的自主性。然而,全球治理正在赋予国家的自主性以新的意义,社会的自主性逐渐开始取代国家的自主性。

面对全球治理的这些发展趋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发展起自己的全球治理理论和全球治理战略。

第一,深化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正确认识全球治理的实质和规律,根据我国的特点和国家利益,形成中国自己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治理观。要正确看待全球化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一方面,要看到全球治理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其国家主权的性质和要素,以及实现主权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任何国家都必须顺应这种变化,而不能躲避这种挑战。另一方面,同样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操纵者和全球治理规则的主要制定者,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则处于被动的地位,其国家主权特别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伤害。因势利导地积极迎接全球治理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而不是消极地对抗或躲避这种挑战,是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唯一正确方向。

第二,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引下,建构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和谐世界”的思想比较集中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和全球治理的原则性立场,体现了中国在 21 世纪初的全球战略。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表达了人类一个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在这个充满风险、冲突和碎裂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尤其应当努力实现民主、和平、公正、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和谐世界”是全人类的永恒追求,也是中国古代“天下大同”这一崇高理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发展,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所在。它所要达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应当在“和谐世界”的理念下,构筑中国的新全球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和全球规则的制定,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努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格局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倡导和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